



古汉语

袁本良 著

古汉语句子结构及变换研究

齊魯書社



古汉语句子结构及变换研究

袁本良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汉语句子结构及变换研究/袁本良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333 - 2585 - 5

I. ①古… II. ①袁… III. ①古汉语—句法结构—研究
IV. ①H1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591 号

古汉语句子结构及变换研究

袁本良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3

字 数 327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585 - 5

定 价 46.00 元

前 言

汉语语法的研究向来就有“词法”与“句法”之分。本书研究古汉语的句子结构，自然属于“句法”的范畴。

句子结构的研究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语语法研究史上曾经有“词本位”和“句本位”的说法，^① 这种说法始自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黎先生主张汉语语法的研究应该打破“摹仿从前西文 Grammar 的‘词类本位’的文法组织”而采用“‘句本位’文法底研习工作”，即“先理会综合的宏纲（句子），再从事于分析的细目（词类）”。^② 从此之后，“本位论”一度成为汉语语法研究中常见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本位论”所指的是语法研究的出发点或语法书的组织方式，那么从“词法”到“句法”的“词本位”和从“句法”到“词法”的“句本位”，一样都可以成为语法研究的有效途径，因为二者从方法和步骤上说是综合与分析的互逆关系，“讲法虽然不同，目的却是一样”^③。如果“本位”的所指还含有语法研究核心的意义，那么应该说，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

① 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陆续还有“词组本位”、“字本位”以及“小句中枢”等观点。

②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3 页。

③ 何容：《中国文法论》（1942），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3 页。

语法著作，从来都是把“句法”即句子的构造规律，作为研究中心的，并不存在以“词法”为中心的“词本位”。

《马氏文通》(1898)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语法学著作，它所创立的正是以“句法”为中心的汉语语法体系。作者自言：“是书本旨，专论句读。”^① 尽管从目录上看“论句读”只在全书十卷中占了一卷，但以句读理论为指导、以句读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句法分析贯穿了《马氏文通》全书。《马氏文通》中有一段话，自言第二至第九卷讨论实词、虚词的原因。作者说：

欲知句读之所以成，当先知起词、语词之为何。于是焉第二卷之论名字、代字者，所以知起词之所从出也。后四卷之论动字、静字者，所以知语词之所由生也。七卷之论介字者，为夫起词、语词之意或有不足也，则知所以足之者也。八卷之论连字者，为夫语词与语词之或相承转也，则知所以维系之者也。九卷之论助字者，为夫语词辞气之有疑、有信也，则知所以传之者也；猝有所感，则辞气不及传，而发而为声者，附以叹字终焉。字分九类，凡所以为起词、语词者尽矣。(第 385 页)^②

可以看出，《马氏文通》对词类的讨论，始终是围绕着句读结构中“起词—语词”的结构关系来进行分析的。所以，表面上看前八卷是“词法”的内容，实则无处不着眼于“句法”。由于作者对古汉语句法结构规律的阐述大多已见于此八卷之中，所以

①马建忠：《马氏文通·例言》，见《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5 页。

②本书标示《马氏文通》引文的页码，所据皆为《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最后的“论句读”一卷只是这方面规律的综合总结，“散见者总之，未见者补之”（第385页）。与其说《马氏文通》是以“词法”为纲、不如说它是以“句法”为纲、词类为目。如果我们根据《马氏文通》表面的篇章格局，简单地认为马氏的语法体系是以“词法”为中心的，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句子结构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由汉语语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汉语中的词不存在印欧语那样的形态变化，句子的结构也不是以词形变化而是以语言成分组合的次序、层次以及虚词的使用等句法因素作为语法手段。这样，句子结构分析不仅对句子结构本身诸多因素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就是“词法”中对词的分类研究也离不开句法功能的分析。正因为如此，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著作，不管采用的是何种组织格局，无一例外地都会以句子结构作为研究的核心和重点。

关于汉语句子结构的研究，在上世纪中后期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句法^①层面的结构层次和结构关系。8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语法学界提出了“三个平面”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总结和运用，标志着语法研究突破了既往只关注句法形式或句法形式与意义杂糅的模式，为全面准确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路。应该说，“三个平面”的理论已经获得了当今语法学界的共识。在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中，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把句法分析跟语义分析、语用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在对一些语法现象的认识上获得了新的进展。不过，总的看来，古汉语语法研究在句法层面之外的探讨还相当薄弱。

①“句法”一词实际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意义对“词法”而言，指的是语法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另一个意义对“语义、语用”而言，指的是句子结构中的一个层面。本书为便区分，对于前一个意义的“句法”一般加用引号，而将通常所说的“句法结构”称作“句子结构”。

试以句子类型的研究为例，胡裕树（1998）曾这样评价过现代汉语句子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还只着重句法平面的“句型”研究；而语用平面的“句类”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至于语义平面“句模”的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总的来说，还没有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句子的类型，还没有在句型分析的基础上跟句类、句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所以目前的研究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①

胡先生的这段话是十几年前说的，但这一评价正好适用于现今的古汉语句子类型研究。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古汉语句子类型的研究多局限在句法层面；语用层面除语气（陈述、祈使、感叹、疑问）、表达（叙述、描写、判断）类型之外，其他方面的分类还缺乏认识；至于语义层面的结构类型，则几乎没有全面细致地考察和归纳。这就是说，语法学界对于古汉语句子的类型，至今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更未能形成比较成熟并获得公认的看法。由此看来，加强对句子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的全面考察和分析，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提升对古汉语句子的认识，应该是古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对古汉语句子结构的研究中，不管是句法层面还是语义、语用层面，只对它们进行静态的描写是不够的。吕叔湘（1990）曾经指出，语法研究不仅要进行静态的描写（语句的分析，成分的归类等），更应该进行动态的研究（句子内部各种成分之间的

^①胡裕树：《汉语的句子类型·序》，见《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相互制约，某一句式适用于哪种环境，环境有某种变化时句式要不要随之变化等)。他说：

静态的研究当然重要，这是基础。可是语言毕竟只在使用中存在，这方面的研究更联系实际。我觉得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太不够了。^①

对句子的结构进行动态研究，“不仅仅满足于找出一些静止的格式，而是要进一步观察这些格式结合和变化的规律”。这里就涉及一个方法问题，“怎样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应该是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对于学习的人更为有用的工作”^②。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法研究中的变换分析法，正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

汉语语法的事实告诉我们，“句子可以不改变其基本意义而改变其内部次序”^③。因而，“从表达的平面说，相同的语义关系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④。在语法研究中，分析具有相同语义关系的不同句子形式之间互相变换的关系，对深入认识句子结构的特点有着积极的意义。

上世纪中期以来，变换作为一种语法分析法开始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广泛运用并逐步发展；80年代之后，其运用逐渐扩大到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唐钰明（1995）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变换”问题》中说：“变换作为一种动态分析方法，在现

① 吕叔湘：《致第二届现代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的贺信》，载《汉语学习》1990年第4期。

②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1页。

③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5页。

④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页。

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这种方法是否适用于古代汉语，至今依然存在争议。”^①十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不少语法研究学者的实践之后，变换分析法可以用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的观点，应该已不再有人怀疑。

变换作为一种句子结构的动态分析方法，在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中正日益显现出它的特殊作用，因而古汉语的句子变换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代学者把这种方法自觉地运用于古汉语语法分析的诸多方面，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不过就目前看来，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变换分析法的运用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变换材料使用上的问题、变换类型的认识问题、变换分析中如何结合语义分析以及语义关系的“同一性”问题等。

以上的分析说明对于古汉语句子结构的多层面认识和变换分析，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书以古汉语的句子结构为研究的中心，通过对句子结构的多层面（句法层面、语义层面、语用层面）立体的静态考察以及句子结构变换的动态分析，力求在古汉语句子构造及相关问题上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就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而言，本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对传统代表性语法著作中涉及句子多层面认识及变换分析的相关论述进行溯源性梳理，从而对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论进行总结和提炼；二、对既往古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些较少措意或虽已有研究而尚存歧见的句子类型，进行多视角的考察，以期对相关的语法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对相关的语法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现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分述如下：

^①唐钰明：《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变换”问题》，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平面”理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得以全面阐述和深入研究。但实际上，一百多年前问世的《马氏文通》及其后出现的几部传统语法学著作，在考察汉语句子结构的时候，研究者从来没有只局限在句法层面上，他们在对句法结构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语义或语用的因素。与此同时，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广泛运用的变换分析方法，在几种重要的传统语法学著作中也早已存在不少运用实例。可以说，传统语法学中关于汉语句子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以及变换方面的众多分析实践和零散的理论探讨，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珍视和认真研究。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识之士指出，当代汉语语言学要开创新的局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就有必要在继承中国学术“重事实”的基础上，增强理论意识，加强理论研究。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①，从而进一步开阔当代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提升当代语言学的理论水平。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考虑，本书把几种古汉语语法的重要著作作为研究材料，考察传统语法在句子结构多层面认识和变换分析方面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启示。

本书考察的传统语法著作主要是三种：一、马建忠《马氏文通》（1898）；二、黎锦熙《比较文法》（1933）；三、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② 选择这三个材料，是基于如下考虑：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它们是专论或涉及古汉语语法的著作。《文通》七千余条引例^③，上自先秦，下至唐代韩愈，它研

①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②以下行文中，《马氏文通》、《比较文法》、《中国文法要略》三书分别简称为《文通》、《文法》、《要略》。

③《文通》引例的数量，据张万起先生统计为7326条。

究的是古汉语（文言）语法，自不待言；《文法》是一本重在古今比较的语法书，其材料是“取例古文，间译今语”；在《要略》的研究中，文白比较也是重要内容，而且“书中举例，文言较多”^①。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传统语法学（相对于现代语法学而言）中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代表性著作。用它们作为考察对象，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传统语法学对古汉语句子结构的认识。

其次，这三部著作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都具有独特的意义，至今仍给我们的语法研究带来很多有益的启发。

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文通》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汉语语法著作，同时也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地描写和分析古汉语语法的著作。其内容之丰，引证之多，释例之细，皆为后世同类著作所不及。不仅如此，它在古汉语语法规律的揭示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②。

在汉语语法史上，《文法》^③一书可以说是比较语法的开山之作^④。此书沿用作者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中创立的语法体系，引用《文通》的古文例句并进行文言、白话比较分析。《文法》一书篇幅不大，但风格独特。它不仅在语法学史上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在语法理论的阐释和语法方法的应用上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要略》一书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与同期出版的其他有影响的汉语语法著作如《中国现代语法》（王力，1944）相比，此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例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 吕叔湘：《重印〈马氏文通〉·序》，见《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 此书初名《文法会通》，1933年改名《比较文法》正式出版。

④ 1933年，刘复有“文白兼讲”的《中国文法讲话》出版，但此书只出了上册，且篇幅小、内容不完整，不成体系，出版后影响不大。

书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文白对比，内容涉及古汉语语法；二是此书是汉语语法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对汉语句法全面地进行语义分析”^①的著作。书中采用“词句论”和“表达论”分立互补的研究格局，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相互关系上对汉语语法进行全面的描写分析，此种研究格局为该书所独创。在这种独特的研究体系中，作者的“许多见解富有启发性”^②，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地影响。

第三，就本书所研究的古汉语句子结构的多层面认识及动态分析而言，以上三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可以作为古汉语语法研究中构建句子结构体系（静态的体系和动态的体系）方面的参考。

就汉语句子结构的多层面认识而言，通过对这三部著作的考察可以看出，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上，语法学家对句子的语义结构、语义关系、语用条件等早有关注。《文通》在“字法句法”之外，还不时讨论到其中蕴含的“互相维系之情”^③。“字法句法”是语法形式的问题，“互相维系之情”则是语法意义的问题。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马氏在句读分析中创立了“句法—语义”双重标准的“词”“次”理论，以此来对古汉语的句子结构进行考察说明。在《文法》一书中，作者沿用《新著国语文法》的体系，把句子中各词语的次序叫做“文学的次序”，把词语所反映的“判断中的思想的各部分的次序”叫做“伦理的（即逻辑的）次序”，并认为语法研究的目的正在于“从句子底文学的次序上，透进一层，看出逻辑的次序来”^④。这里所说“伦理的次序”正

①②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马建忠：《马氏文通》（1898），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页。

④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语义结构，而“文学的次序”则相当于句法结构。后世学者认为，在结构主义语法尚未产生的年代，这种“句法组织的两种次序说，实在是很可宝贵的”^①。至于以“对汉语语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而为后世学者称道的《要略》一书，不仅在“表达论”中全面涉及汉语句子的语义、语用分析，而且在“词句论”中也通过句子类型、句子成分的讨论，阐述了作者多层面的句子观，书中提出的“动词中心论”和“动补关系亲疏论”^②，正是对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进行考察的结果。可以说，这些研究为后代学者的语义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出于实用的目的，这几部著作在语法分析中还特别注重对句子辞气（语气）和节律等因素的讨论，其中所阐释的规律，对汉语句子语用结构的认识也有一定的贡献。

在句子变换的方面，有学者指出，《要略》一书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③。事实上，最早使用变换方法来研究汉语句子结构的是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文通》。《文通》中有不少涉及句法结构变换的例句。从这些例句看，作者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训诂学中的“变换训释”（即通过变换句式来进行句义解说）^④的樊篱，自觉地把变换作为语法分析的一种手段，并且在相关的论述中，还揭示了句法形式的变化与语义变化、辞气变化的关系。尽管《文通》中这一类的分析比较零散，但它无疑是

①张拱贵、廖序东：《重印新著国语文法·序》，见《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作者认为叙事句的中心是动词，其他成分都是动词的补词，其作用是补充动词把句子的意思说明白，但它们跟动词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参看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4），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页。

③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

汉语语法研究中最早尝试运用变换方法的。^①《文法》一书，作者自言研究的“着重之点，乃在变式之句”，意在“以逻辑之常经，取文学之权变”^②，因此，自然有不少涉及古汉语句式结构变换分析的论述。书中关于“词位”变化与句式变换关系的若干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汉语语法中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上二书的句子变换分析，总的看来还未形成系统，而《要略》一书的句子变换分析则可以说是全面而又系统的。仅就书中的古汉语引例而言，其变换分析涉及到了句子结构变换的众多类型，几乎涵盖了汉语句法形式变换的所有方面。而在这些丰富例证的分析中，还阐明或隐含了诸多句法变换的原理和法则。不仅如此，作者在变换分析中还把古汉语的句子结构置于句法、语义、语用的多层背景下来观察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实用的动态语法研究过程。这部著作关于古汉语句式结构变换的深入观察和精当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古汉语句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③

就当前的古汉语语法研究而言，尽管句子的构造规律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心，但其中还存在不少认识不清或见解分歧的问题。比如，在句法层面，对一些句法结构形式（如“其+动”“名+者字结构”“形+宾”）究竟属于怎样的结构性质，语法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而像“动+之+名”与“动+其+名”是否是同样结构这样的问题，学者们也往往各持己见。在语义层面，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领域，而且集中在动词句的语义分析，甚至仅仅局限在动词句中施受关系的讨论上。动

① 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② 黎锦熙：《比较文法·绪论》，见《比较文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③ 具体分析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一、二、三节。

词句虽然是汉语中最重要的一类句子，但对它的研究显然不能代替整个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系统的研究。相比之下，古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就更加薄弱，句子语义方面的不少相关问题至今无人问津。语用层面，古汉语的研究中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句子从语用的角度可以进行怎样的分类，句子中有哪些类别的语用成分，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怎样的语用效果等等，都还有待认真地调查和研究。至于古汉语句子结构的变换，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一方面的考察分析也还尚待深入。除变换的类型、法则之外，还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如变换分析中如何正确地结合语义分析，如何处理好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如何认识语义的多层次性和变换中语义关系的“同一性”等。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书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句子类型，从句法、语义、语用以及结构变换各方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多层面的综合考察，有的则在考察层面上有所侧重。这些句子类型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通过考察准确地认识这些句子类型真实的语言面貌；二、从这些句子类型的解析中分析和归纳古汉语句子结构的相关规律。比较而言，上述第二个目的显得更为重要。举例来说，本书研究“形·宾”结构句，其目的除了了解这类句子的句法、语义、语用的特点外，更在于由此探讨古汉语中形容词充当述语的句法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词类活用”等语法问题。^①对于“否”字句的研究，除对这种句子得出多层面的全面了解之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澄清长期以来读者对于“否”字词性的错误认识，并进一步对谓词性代词“否”衍化为传疑语气助词“否”的历史过程和衍化机制进行探讨。^②对于

①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②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之于”句的研究，除句式本身特点的全面认识之外，并由此了解介词“于”字所具有的在句中不独立的主谓结构里充当谓语这样一种句法功能。^①再如对于“动+之+名”结构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认识这种结构自身的特点，还在于借此认清句子变换中如何考虑语义结构的层次、如何区分语义关系的主次显隐等。总而言之，书中讨论这些句子类型，目的在于对既往语法研究中的相关诠释做出重新审视和思考，从而对相关的语法规律得出正确的认识。

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前一方面是历史认识的溯源，后一方面是现实问题的探究。两个方面的研究均围绕“句子结构的多层面认识和变换分析”这一主题展开，形成全书的研究框架。我们希望这种研究格局能够体现语法理论和语言事实的有机结合，既有助于对前人著述中理论价值的提炼，又有助于当下句子结构研究中语法事实的正确认识和相关规律的正确表述。

就研究者的愿望而言，围绕古汉语句式结构的多层面认识和变换分析展开的研究，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古汉语句式结构的特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由此出发，在对相关材料的整理分析中也就有了一些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对某些语言事实考察探究后得出的看法也有一些他人未发之处。这些思考和看法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为古汉语语法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就只有通过本书来接受读者的检验了。

^①详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古汉语句子结构的多层面认识	1
第一节 句子结构多层面认识溯源（一） ——“词”“次”论考察	1
第二节 句子结构多层面认识溯源（二） ——“词句论”句子观考察	25
第三节 句子结构多层面分析例（一） ——“否”字句研究	36
第四节 句子结构多层面分析例（二） ——“之于”句研究	63
第二章 古汉语句子句法结构研究	103
第一节 句法结构分析法溯源	103
第二节 句法结构分析例（一） ——“其”字句研究	119
第三节 句法结构分析例（二） ——“者”字句研究	132